



国家与学术 的地方互动

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

王东杰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

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

王东杰 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925~1939)/王东杰著.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1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2187-0

I. 国… II. 王… III. 四川大学-校史-研究-
1925~1939 IV. G649.2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857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8.8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大学格局与地方政治：	
从“三大”鼎立到国立四川大学	18
第一节 “成、高纠纷”	18
第二节 “三大”鼎立	46
第三节 国立四川大学的成立	72
第四节 小结	91
第二章 “不在场”的中央：“国立化”初期的惨淡经营	98
第一节 “三大”矛盾的继续	99
第二节 在困境中维持川大的努力	108
第三节 王兆荣任职期间川大的基本情况	127
第四节 中央入川与教育部整顿川大	139
第五节 小结	151

第三章 “把国立二字真实化”：任鸿隽长校时期的改革	154
第一节 任鸿隽长川大	155
第二节 任鸿隽的治校思想	160
第三节 “现代化”与“国立化”的具体措施与表现	171
第四节 《川行琐记》事件与任鸿隽去职	200
第五节 小结	223
第四章 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	
“拒程”运动的前前后后	235
第一节 “国立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236
第二节 “拒程”运动	255
第三节 余波：从“国立化”到“党化”	291
第四节 小结	298
第五章 大学中的“国家”：总结与思考	303
 后 记	 330
参考文献	332
重要人名索引	347
出版后记	355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	----------

**Chapter 1: The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and Local Politic: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to National Sichuan University 18**

1. The Dispute between National Chengdu University and Na- tional Chengdu Higher Normal School	18
2. The Tripartite Balance of Three Universities	46
3.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Sichuan University	72
4. Brief Summaries	91

**Chapter 2: The “Absent” Central Government: Keeping the
University by Painstaking Effort During its Early
Period of “Nationalization” 98**

1. The Lasting of Contradiction of the Old Three Universities	99
---	----

2. Keeping the University by Painstaking Effort in Difficult Position	108
3. The Basic Situation during the Age of Wang Zhaorong	127
4. The Enter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to Sichuan and Rectifying of National Sichuan University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39
5. Brief Summaries	151

Chapter 3: "Implement of the Nationalization": Reform by Ren Hongjun

1. Ren Hongjun Became the President	155
2. Ren Hongjun's Idea about Higher Education	160
3. The Measures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171
4. The Disturbance on <i>Chuan Xing Suo Ji</i> in 1936 and the Resignation of Ren Hongjun	200
5. Brief Summaries	223

Chapter 4: "Turning to a true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Round about the "Campaign of Refusing Cheng Tianfang"

1. The Pushing on Rapidly of "Nationalization"	236
2. The "Campaign of Refusing Cheng Tianfang"	255
3. Repercussions: From "Nationalization" to "Controlled by KMT"	291

4. Brief Summaries	298
Chapter 5: "State" in University: Summary and Reflection	303
Postscript	330
Bibliography	332
Index	347

绪 论

在西方历史上，大学曾一度颇具“世界精神”（主要是欧洲的小“世界”）。大学的师生来自欧洲各地，使用着同样的学术语言，分享着共同的文化预设，可以在欧洲的各大文化中心受到学者应有的待遇。^{〔1〕}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大学在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

在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问题对大学来说尤为重要。首先，大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竞争的产物。其次，作为外来的学术建制，大学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存？中国人如何使其成为中国“自己”的大学？换言之，如何使大学“国家化”或“国理化”（nationalization）？只有中国有了自己的大学，才能有效地应付与西方的“学战”。^{〔3〕}在这一关怀的驱使下，20世纪二三

〔1〕 金耀基：《大学的世界精神》，《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2—73页；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 具体情况参看 Sheldon Rothblatt,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505—535页；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1—125、128—129页。需要指出的是，Sheldon Rothblatt 提醒学者，不宜夸大中世纪大学的所谓“世界精神”，它们在国家与地方事务中仍然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

〔3〕 还在留学期间的胡适对此就有所体会。在《非留学篇》中，他把兴办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视为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参见罗志田《胡适传——再造文明之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125页。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学术独立”的问题。同时，在中国现代诸多民族主义抗议运动中，大学生无疑充当了主力的角色。^{〔1〕}

就目前的研究看，中国大学的国立化（或国家化）运动，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和民族主义的两个向度相关。一是对外的，主要例证为教会大学及清华学校（大学）。对它们来说，国家化的目标和表现即是争取学术独立、收回教育权。简言之，要使大学成为“中国的”。在这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成为中国大学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领域。^{〔2〕}

但是，正如罗志田教授指出的，民族主义在“抗议”一面

〔1〕 参考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又，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也探讨了“学生”群体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兴起。

〔2〕 关于教会大学，1949—1993年的中文研究著作见王继江、廖梅编《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的第4部分《基督教与中国科技、教育及文化》，收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2—481页。1994年后的论著有章开沅《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吴梓明《岭南大学与中国现代化》，顾学稼《华西协和大学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均见顾学稼、林霭、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4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226页；珠海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著作，包括《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刘家峰《调适与冲突：1950年前后的教会大学——以齐鲁大学为个案》，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335页；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第8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142页；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金以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第2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2—308页；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4—197页。关于清华大学的“国立化”，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关于“二战”以后台湾的大学“国立化”情况，参见李正心《论光复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祖国化》，《教育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外，还有着“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我们过往的研究不甚注意的。^{〔1〕}这一面在大学“国立化”问题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如何使一所大学成为“国家的”，这也同时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或私人之间的竞争。^{〔2〕}本书考察的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就是这样一个事例。川大远处内地，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很小，主要与国内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别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影响。我希望通过对此进程的考察，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国立化”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等问题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事例，以增进我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多层面上展开的了解。

毋庸讳言，四川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特别是在抗战以前，并不占有若何重要地位。虽然是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不论是地域所在还是学术名声，以及在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这样的题目似乎仅对生活在四川大学的人们才有意义，对“校史”以外的历史研究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

诚然，历史学不是“邻猫生子”之类的街谈巷议，它总是要回答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重要”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宏大”的问题，更不等于“宏大事件”。一个问题的

〔1〕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及《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的诸篇文章。

〔2〕 在这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较为单薄。陈三井在《民初西南大学之倡设与弃置》一文中谈到了民初地方势力筹设大学的情况，并从政治派系斗争的角度论述了西南大学的酝酿与“胎死腹中”的过程。不过，他的主要观点在论证“地方武人因政治斗争不惜摧残教育”。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论述中国现代教育与国家关系的人类学著作，参考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王铭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170页；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重要性反而往往体现在那些具体而微的事物中。尤其是“国家统一”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它对诸多相关领域之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行政层级中的表现，就很难说我们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事实上，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见微知著”的案例。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初，四川政治和社会自成格局，四川大学也颇受影响，“国立化”进程与川内政局的变化密不可分。其中不仅牵涉到把持川政的各军阀（主要是刘文辉和刘湘）之间的势力消长，更与四川的“地方中央化”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出 30 年代国民政府的“国家统一”计划在四川的实践情况。

由于川大师生以四川人为多（具体比例随时代不同有所变化），因此，其“国立化”进程还涉及“四川人”的省籍认同以及在特殊情形下“四川人”与“中国人”的身份冲突。这些问题在任鸿隽的改革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方面特别突出，也在 1938 年底的川大易长风波上有所体现。它与整个四川特别是成都社会思潮的变化有关，也不乏政治因素的作用。

处在近代中国“趋新”大潮的激荡下，四川大学的国立化也牵涉到新旧思想、教育体制乃至学术典范（paradigm）转移的问题。直到 30 年代中期，由于僻处一隅，四川的文化界和全国比起来，还显示出不少特色（未必是地方性的，却往往被“先进”地区的人士认为是“地方”的）。比如说，在文史学术方面，四川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典范便不尽相同，带有较浓厚的晚清民初色彩，在“不断更新”的民国时期便不免显得滞后。

若从“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看，这一进程还牵涉“学术独立”（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大学“自治”）的问题。在当时四川大学不少师生的眼里，“国立化”意味着大学从此可以免于地方军政势力的干涉和威胁。因此，对“国立化”抱有相当

积极的态度。在“国立化”中期，这一目标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程天放出长川大，“拒程运动”失败，“国立化”的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学术界所希望达到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理想却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本书涉及的并不完全是一新课题。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统一运动，目前学界的研究似不算少，^[1]但仍有不少值得继续注意的问题。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国家统一”要从“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加以了解方为全面。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全国”的大范围着眼，人们是如何从“地方”甚至更为基层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做出反应的，研究明显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的薄弱。比如说，关于地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冲突，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两广地区。^[2]对派系纷争尤烈的四川军人，却研究极少，已有的著作也多集中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范畴内，社会心态史则基本

[1] 笔者所见包括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考的系谱》第8章《构筑“中华民族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217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收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第389—431页；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湾弘文馆，1986年；石岛纪之《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收入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下径引书名），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8—297页；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相关的研究并见筹委会主编《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

[2] 这和两广军人较多地参与了全国范围内的军事竞争有关。关于两广军人，除了前引一些著作中的相关章节外，笔者所见还有 Eugene William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M.E.Sharpe, Inc., 1993; John Fitzgerald,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Guangdong Cooperative Movement, 1932—1936*, *Modern China*, Vol.23 No.4, October 1997, pp.420—458.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上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确知时人对地方（如四川）与全国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比如说，从知识界的立场看，军阀、国家统一这些问题有何意义？它们对学术界的影响如何？此一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人们怎样处理“省籍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都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关注不够的。^{〔2〕}但是，缺乏了对地方社会心态的认知，所谓“国家统

〔1〕 目前对二三十年代四川的研究，多集中在“军阀史”的领域。1987年以前国内的研究和资料出版概况，见孙代兴《西南军阀史研究述评》，收《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7—47页。90年代以后主要有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研究这一问题比较专门的著作。但是遗憾的是，该书在“学术规范”方面所做较差，引文多无出处。此外，多从政治权力斗争方面着眼，相对忽视了社会和文化竞争的层面。王玉娟从基层行政人员任用的角度涉及此一问题，见她的《民国川政统一初期（1935—1939年）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湘政府对川省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倾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则从“武力”这一角度分析了军队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对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对四川的控制做了研究（此书有中译本，题为《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但我没有找到，故本书径引英文版原书）。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的部分内容利用蒋介石日记等档案材料探讨了蒋介石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决策的确立过程。抗战期间的有关资料，参考编委会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刘君的《简论西康建省》（收《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21—331页）亦涉及相关问题。

〔2〕 王尔敏曾经讨论过戊戌时期湖南地方思潮的兴起，特别注意到外省人士的作用，见《戊戌湖南客籍人士对于地方思潮的启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1976年；刘伟探讨了晚清时期“省”观念的突出所由发生的原因，见《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统添则讨论了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与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互动关系，见《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在地方史方面，苏云峰研究过20年代湖北人的“省籍意识”与自治观念问题，见《联省自治声浪中的“鄂人治鄂运动”：兼谈省籍意识之形成及其作用》，《认同与国

一”也就往往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力（辅之以军事权谋）的运作过程，而这一印象至少是不全面的。本书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些微的弥补。

具体到本书的主题来说，任以都教授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中，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提到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运动，并把它视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计划得以“进步”的双向互动过程。^{〔1〕}不过，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任文对此仅是一笔带过，没有做更为具体的考察，所述也仅仅集中在任鸿隽时期，因此难以洞察这一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多元因素作用。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在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四川大学史稿》中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四川军人与四川大学的关系、四川的地方“中央化”等问题也做过叙述，但它从“校史”的角度入手，更关心的是学校自身的发展过程，对上述因素的影响力重视不够，其研究也嫌过于简单。^{〔2〕}

作为个案研究，本书属于中国大学史或教育史的研究中广义的“校史”一类。目前，在这一领域中，除了教会大学史外，显得相对薄弱。已有的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教育政

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则从旅外人士的视角着眼，所谈亦与本书有不少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程美宝讨论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与国家观念的互动关系，见《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417页。程氏的另一篇文章《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对清末思想界由爱乡至爱国的思路做了探讨。

〔1〕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2页。由于任教授是任鸿隽先生的长女，这使她的写作在历史学诠释以外，或还具有家属回忆的性质。

〔2〕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此书的个别章节（主要是第4章《激流勇进（1931—1943）》）也存在着不注材料出处，甚至误注材料出处的问题。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

策、制度与措施的研究，一是各校的校史研究。^{〔1〕}

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度与措施，一直是大学史乃至教育史研究的重点。^{〔2〕}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变化。因此，这种路数的好处之一就是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现代大学学制、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学校的管理方针等全国性问题的基本变化和发展趋向的角度。这种路数特别注重统计数据的应用，在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师资力量、经费筹措以及设备增减等问题上尤能发挥其特长，并同时注意到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教育的“内部因素”的变化。

但是，这一路数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在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倾向于放任。在这一时期，如果只注意到一些全国性的大问题，就有可能掩盖更为多元化的大学面貌。即使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全国教育的管理也

〔1〕 关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参考江铭《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周谷平《教育史学科建设刍议》、苗春德和吕云飞《河南省教育史学科：1978—1996》，以上三篇俱载《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许国春《对近年中国教育史研究之研究》，《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伦信《台湾地区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概况》，《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炳昌《教育史》，收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32—249页。教育史研究目前多属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在路数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参考佩尔·索拉《教育史是历史学科和传统人文学科的扩展》，收卡特林娅·萨里莫娃、欧文·V·约翰宁迈耶主编：《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方晓东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4页）。在中国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一学科本身的“学术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刘海峰在《高等教育史研究之探讨》（《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特意提醒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者应具有“引文意识”。但遗憾的是，这一现象至今未得到明显改善。

〔2〕 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本；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吕士朋《抗战前十年我国的教育建设》，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3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1927—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前掲金以林书和文。

随着时间和人事的变化多所更张。至少在陈立夫作教育部长之前，各大学在行政机关、课程设置、师资聘任等重要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小的自主权。对此，这一注重共性的路数就显得过于简略了。

其次，这一路数太过偏重“典章”方面的研究，往往忽视了政策、制度或措施的落实情况。^{〔1〕}在现实生活中，一种政策未必能够真正的落实；落实之后，在操作方面，也往往随着实际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损益。因此，对历史学来说，政策“落实”的情况常常更重要。一个社会真实而复杂的情形，只有通过政策、制度与措施的落实和操作的情况才能得以展现。^{〔2〕}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那些更基层的、个案性的研究。

第二种路数是“校史”研究。这种研究往往站在某所大学的立场上，所注意的是该大学的“成长”历程。因此，它比宏观的政策史、制度史和措施史的研究更为切实，更能表现出一所大学发展的具体语境以及它对这些语境的灵活因应。显然，对我们了解更全面、也更细致的大学史来说，校史的写作大有可为之地。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校史研究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校史的写作者们往往缺乏更为“历史学”的关怀。他们的写作对象和关注重心通常都是自己所在的大学，在写作过程中不甚注意把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现代社会”或“中国现代大学”的概念考虑进来。这使得他们的写作过于偏重本校的“成长”经历，有时不免偏离了价值中立的学术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也常常注意到学校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却又

〔1〕 于进胜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中国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即提醒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区分开来。

〔2〕 王东杰：“回到听讼现场”，《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7月4日第14版。